

学林

← (上接7版)

虽然我们的译注稿是汉语学术界最早问世的单篇成果,但高明士先生在台北主持的唐律研读会早在2007—2009年间便已完整读过一轮《天圣令》,又于2011年10月1日开始重新检视此前完成的初稿。2012年12月1日,我在台湾师范大学参加唐律研读会第223、224次活动时,他们就曾完整审读过一遍“杂令”宋令部分的译注。自从我们的单篇成果陆续出版以后,以高先生为首的台北同仁非常关注北京这边读书班的进展,如古怡青就曾在《从差役看唐朝流刑的配送与执行》(《成大历史学报》第53号,2017年)中指出我们“关市令”译注稿的疏漏之处。2018年4月26日,我收到高先生主编的《天圣令译注》(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7年),这就轮到依据这一成果,重新检视自己的译注稿了。

除了译注稿外,以东京大学大津透先生为首的团队十多年来始终在进行《新唐令拾遗》的编纂工作。他们分工明确,各自浸润于相关领域多年,对各篇令文及相关史料、先行研究等极为熟稔。正因如此,我们读书班完成的每一篇译注稿,都能在他们的团队中找到最为适切的评论人。如2014年2月11日,我收到大津先生来函,称收到《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》第7辑,他已将“仓库令”译注稿出版的信息转告武井纪子;2016年5月21日,我应大津先生之邀,出席在东京大学文学部举行的课题报告会。会上,大津先生向各位成员介绍《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》第9辑的相关情况,尤其是“关市令”和“捕亡令”两篇译注稿,这是吉永匡史钻研的领域。

我们读书班撰写译注稿,也采用分工合作的方式。黄老师每次都会根据条文内容,将每篇令文划分成若干部分,提前分配给几位同学,请他们撰作译注报告,然后到读书班上展示,让所有参与者提出疑问与建议,而报告者在吸取大家的意见后,再做成初稿;等这篇令文全部解读完毕时,再由我向各位报告者征集初稿,进行统合、整理之后,形成二稿,群发给大家,再次征集意见;这种征集意见、再修改的工作,一般要持续三轮以上,最终由我整理定稿,交付出版。

统稿的工作一般集中在暑假。夏日炎炎,热浪逼人,我在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的最初数年里,蜗居于本校昌平校区家属院的周转房中,室内没有空

调,因书籍占据了大部分空间,连放下电扇的余地都没有,本就烦躁难耐,再看到成诸众手的初稿,体例各异、引证有别,因此有时邮件行文难掩怨气。三位老师与同学们总是以极大的善意包容我的失礼。

尤其是吴老师和黄老师,即使是在身体极度不适、参会最为频密的时候,依然逐字逐句、逐次逐轮地审读每一种译注稿。如2014年7月23日,黄老师在收到“厩牧令”译注初稿后回复:“译注稿收到了。这几天图谱和采访的事压得很紧,我尽量抽时间看吧。早上给吴丽娱打电话,她已经在审读了,还是个劳模老太太啊。她在家摔了一跤,据描述,严重程度与我3月份摔的差不多”;2016年7月5日,吴老师发回“假宁令”译注初稿的审订意见,当时她的血压又升至一百八,差点儿被医生留下住院;2018年7月22日,我在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回访,并着手整理“营缮令”译注二稿,因没有带台版《天圣令译注》,有些意见无法确认,于是向黄老师求助。翌日接到黄老师回信,他正在首都师范大学开会,为了能在会场审读译注稿,他还特意带去了部分台版译注的扫描件,并在第二天散会回家后,又给我发来了剩下部分的电子版。

就在这样的情况下,他们有时还要费心费力地劝解因统稿而处于焦躁状态中的我。如2016年7月2日我在单独发给两位老师的邮件中,表达了心灰意冷的消极情绪。吴老师于翌日回信宽慰:“理解你的烦恼和辛苦……问题是既然干了,虎头蛇尾或者中途而废总是不太好”;黄老师也接着吴老师的邮件,继续开导:“你的气愤我完全可以理解。给大家发信也是对他们的一种提醒和促进,是有必要的,特别是其中提到要珍惜个人名誉也要珍惜读书班的声誉,说得很好。我也同意吴老师的意见,批评归批评,还是应该努力把它的做完。”回想起老师们常常为了一个字词、一句令文的理解,不断查证史料,往返三四轮邮件讨论,我就倍感惭愧。

其实读书班的师友们不仅在集体成果的撰作上无私奉献,即使是对各位同学的个人习作,大家也都会倾力相助。如读书班在2009年12月讨论“田令”唐18、21条出现的“财没不追,地还本主”一句,因《唐律疏议》第166条将相关令文表述为“财没不追,苗子及买地之财并入地主”,所以令文之难以疏解。我为此撰写了6千字的底稿,并在当月28日的读书班上陈述已见。此后半年多

时间,我一直都在纠结这一问题,并于2010年10月5日撰成一篇名为《唐代律令中“财没不追,地还原主”试考》的三万字初稿,送呈师友求教。牛老师于当月7日回信,提示《回义门累朝事迹状》中亦见“财没不追”一语,可以留意。当时我已在京都大学留学,网上仅见陈月海主编《义门陈文史考》所录节文,后在阅读许怀林先生所撰《陈氏家族的瓦解与“义门”的影响》时发现义门陈氏宗谱的信息,在检索数据库后,得知见藏于历史所,于是在12日函请读书班同学侯振兵代为查询。振兵兄次日在历史所普通古籍库找到《义门陈氏大同宗谱》并复印了相关部分,当日就发来了扫描件。且当时他以为该书藏于善本库,不易查阅,最终还劳烦黄老师特意陪同,以便请求通融。黄老师则在阅读初稿之后,于11月4日来信,指出部分论证略显“喧宾夺主”,并质疑道:“更重要的是,证明了那句话是令文原文,也就是证明了《唐律疏议》对令文有所修改。这可是个大问题。《唐律疏议》有权力修改令文吗?这种修改为何没有反映在此后的令文中(我们看到的天圣令附唐令也并没有这句话)?这种修改在《唐律疏议》中还有第二个例子吗?”这又使我重新思考相关立论,继续修改初稿。

我之所以赖在高校,不愿意从事实务工作,其实只是单纯地眷恋一种自由自在的阅读生活,从而满足自己的求知欲与好奇心罢了。撰写论文需要“动手动脑找材料”,在谋篇布局之后绞尽脑汁地构建论证框架,反复地自我质疑与不断地自我说服,这对懒人而言是一种难度颇高的挑战。不过,当有师友或无私地分享材料,或帮忙检视行文论证、切中肯綮地

指出问题时,那种莫名的感动就会转化为继续修改的动力。自己可以不争气,但师友的情谊不容辜负。

2009年到2019年,我作为一名青年学子,慢慢蹉跎成了中年大叔。其间自然有令人遗憾的地方,如因去日本京都留学一年、到中国台北和德国明斯特各访问一年,错过了读书班的现场讨论,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我的资深学员地位。而在这十年里,与我有共同体验的读书班学员超过一百人,其中许多同学从硕士变成博士,又陆续走上讲台,分布在全国各大高校以及科研院所。无论是否以《天圣令》及其相关制度为研究领域,通过这一训练,我们至少学会了如何在规范逻辑、法律体系中理解单一的术语和条文,如何在唐、宋史料之外利用日本古代文献,如何突破单一专题研究的限制,进一步从职官、经济、法律、地理等诸方面去提炼问题意识。老师们放弃了个人的休息与研究时间,甚至还要从自己的课题经费、稿费等中匀出一部分钱,为所有参加者提供午餐(社科院食堂的午餐券从8元/人,陆续涨至10元、12元、20元、50元,最后只能任由大家自便,读书班在每学期的重要日子请吃盒饭),这种有教无类的精神、提携后学的公益之心理应在我辈手中发扬光大。

或许更加重要的是,在这个人情淡漠、相交以利的时代中,读书班依然保持着一种难能可贵的温情,让人产生情感上的依恋。2012年新年之初的KTV欢唱、2012年春季学期读书会结束时的生日庆祝、同学毕业离京或外出留学前的送别聚餐、师友们出差或出国归来时分享的异地特产、牛老师时而犒劳大家的自制点心、每学

期末郑重其事的集体大合影,以及2019年11月22日同学们相拥告别,两位老师伫立门口、目送大家离开的场景等,依然历历在目,一旦想起此情此景不复再有,心头不由涌起一阵失落。

2013年以后,我搬到昌平居住。对追求“睡到自然醒”的我来说,每隔两周的读书班更成了无比艰巨的考验。每逢读令的日子,我都要用三个闹钟,在清晨6点把自己从睡梦中叫醒。如果是冬天,还得踏着星光、顶着寒风,摸黑走出本校家属院,赶上6点20分左右的886路公交车,在催人人睡的暖气和因靠站、塞车而走走停停的摇晃中,继续补眠。大约在7点45分达到德胜门,排队进入积水潭地铁站,乘坐2号线,8点左右到建国门。步行至西门后,假装成忘带工作证的历史所工作人员,混入院内,直奔食堂匆匆吃完早餐,然后回到主楼,坐电梯直上12层,慢悠悠地晃进会议室,倒上一杯先来的同学已经打好的开水,开始3个小时聚精会神的研读。

黄老师总是说,中国学者办读书班很少能像日本学者那样十几年、几十年地持续下来,我们无论如何都要咬牙坚持。所以除了我和来自社科院研究生院的同学需要克服被窝的羁绊,一大早从南北两郊往长安街狂奔外,有的同学毕业后还特意坐高铁从外地回京参加,有的同学在读完研后拖着行李箱直奔火车站去赶车,如果能有选择,谁都不愿意错过任何一次读令的机会。正是上述追求学术、奉献公益的理性,加上留恋温暖的感性,成就了《天圣令》读书班这个令人难忘、无法复制的十年,我们也可以自豪地说自己终于坚持下来了。

(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研究所副教授)

谷雨和鱮鱼

赵鹏

今年谷雨时节,忽然想起鱮鱼来。因为按南通古

代的习惯,渔民就是在谷雨这天开始出海捕鱮鱼的。鱮鱼在明清时是南通的贡品,并且上贡数量号为百尾,可缘例只送九十九尾。如万历《通州志·贡赋》记岁进云:“鱮鱼九十九尾,相传初进百尾,上以其一赐渔者。”这个缘故,此志的遗事部分有所记述云:“葛原六者,魁梧豪侠人也,以布衣诣阙下,献鱮鱼百尾。时国初法严,众为危之,则笑曰:‘尔不上食父母耶?君犹亲也,庸何伤?’及至,高皇帝大悦,问之曰:‘鱼美何如?’匍匐前顿首对曰:‘鱼美,但臣未进,不敢尝耳。’又大悦,及命大官赐酒食,仍选一尾还之,曰:‘劳汝劳汝。’其后岁进鱼九十九尾,著为令。”

清代姜长卿的《崇川竹枝词》有一首诗云:“谷雨开洋遥网市,鱮鱼打得满船装。进鲜百尾须头信,未献



鱮鱼的头骨可以拆装成仙鹤形状,名之为“蓋鶴”

君王那敢尝。”其附注谓:“摇网船以谷雨时放洋,只打鱮鱼。明初渔人顾原六献鱮鱼百尾于太祖,问如何味,对以不敢尝。后进鱼必赐一尾。”也是用这个献鱼的事为典,只是可能是“葛”“顾”音近的原因,而把献鱼者的姓氏写错了。